

主编 孙熙国 李翔海

北大中国文化研究

第2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陈先达、方克立、赵敦华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

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景海峰）

清华简《保训》与儒家道统说再检讨（梁涛）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向与多重形式（田文军）

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田辰山）

冯契《智慧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构（李维武）



主编 孙熙国 李翔海

北大中国化研究

第2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中国文化研究. 2/孙熙国, 李翔海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097-4167-2

I. ①北… II. ①孙… ②李… III. ①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5220 号

北大中国文化研究 (第 2 辑)

主 编 / 孙熙国 李翔海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李邦文

责任校对 / 徐兵臣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167-2

定 价 / 48.00 元

印 张 / 20.75

字 数 / 353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特 别 策 划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陈先达、方克立、赵敦华先生

中西马高端对话

/ 3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研究

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景海峰 / 33

先秦哲学研究

殷商时期的原始宗教政治与神权决定论

王 杰 / 49

“天下为公”：古典儒家的“大公政制”理想论纲

林存光 / 66

简 帛 新 探

清华简《保训》与儒家道统说再检讨

——兼论荀子在道统中的地位问题

梁 涛 / 99

论上博楚竹书《凡物流形》的哲学思想

丁四新 / 128

理学研究

平等之难

——宋代科举论议的政治哲学解读

方旭东 / 157

马理理学思想初探

许 宁 / 177

清康熙朝理学的异军

——彭定求的《儒门法语》初探

彭国翔 / 199

现代哲学研究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向与

多重形式

田文军 / 219

熊十力儒学回归的心路历程与思想演进

李祥俊 / 241

台湾宗教文化创意产业

——以天主教新竹湖口教堂为例

吴惠巧 / 26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

田辰山 / 273

冯契“智慧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构

李维武 / 299

特别策划

北大中国文化研究
(第2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陈先达、方克立、赵敦华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

2012年1月11日

主持人：杨河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主讲人：陈先达、方克立、赵敦华先生

主办：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地点：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交流中心泓雅厅

摘要：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要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的历史时期，学术界、理论界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又该如何考虑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问题。在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对话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对话要受历史文化条件的制约，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特别是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要有历史的、时代的眼光。对话的目的是要推进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因此，在对话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吸收西方文化中理性主义的启蒙精神，切实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综合创新。

关键词：中西马对话 马克思主义 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综合创新

* 本文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苏碧莲、路宽、陈铭杰、隋录录整理。经作者同意刊载于此。

杨河：老师们、同学们，大家都知道文化之于人的意义和人之于文化的意义是一样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人创造了文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文化创造了人。最近一段时期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文化自觉、自信、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对于人类来讲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是始终存在的。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经历了严重的考验，也逐渐锻造出了当今的中国文化形态。

为什么近年来我们还要特别强调这些问题呢？我想十七届六中全会对它的发生发起已经做了深刻的解读，其主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首先，改革开放使我们融入了世界历史的洪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开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中国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呈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也更加迫切。其次，改革开放也使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强经济方式转变，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中国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当然，最后，也是由于上述两点所引起，改革开放使我国精神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而不凡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取得一些伟大的成绩，同时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我国文化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新的时期，产生了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十六大以来顺应中国国内面临的新形势和人民的新期待，把文化建设作为中国文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摆上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要更加自觉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七届六中全会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也知道，文化建设的基础还是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在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的历史时期，学术界、理论界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又该如何考虑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请的三位专家进行的文化对话，主要就是从这样一个目的，从这样几个问题和考虑出发的。现在我们请三位专家开始谈自己的看法，首先，我们请



陈先达教授。

陈先达：建宁请过我两次，后来杨河同志又邀请我参加对话，我就事不过三，三次了我一定要来，三次是最高的礼遇，我再不来就说过去了。今天关于中西马对话的问题，我讲几点想法：

第一点，从文化角度来说，中西马对话既属于哲学这块，又属于文化这块，所以中西马对话，它既有文化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我从两条线讲这一点。从文化角度来看，文化像水一样，它是流动的、交会的。文化也是这样的，流动的、会合的。从社会发展来看，文化的融合有三个不同时期。前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是在交融之中融合，民族内部的交流融合，到周边地区的交流融合，在中西文化的角度，它是有限的，那时文化交流的特性是通过贸易和战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文化的交会、交流、融合发生了特殊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特性是向外扩张，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时候，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在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先进性，制度具有先进性，所以在那个时候——西方资本主义传播的时候，文化的冲突并不明显，因为它代表一种先进性的文化，所以，即使在殖民地，在被侵略的国家，人们也可以接受西方文化，可以积极地向西方学习。这在中国很明显，比如，全盘西化思想的出现。进入当代，进入帝国主义以后，文化不但互相融合，文化的冲突也随之而来，因为整个世界变了，西方向外输出其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变成了一种价值观的载体，这两者几乎交融在一起。所以，当代西方向外输出其文化的同时，也输出其价值观。文化冲突正是由此成为亨廷顿著作的主题。实际上，文化本身并不冲突，冲突的是背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是文化载体所承载的价值观，这是间接的。

到现在，只有在中国，中西马才可能对话，为什么？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虽然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比在中国早，中国哲学也很早就传入西方，但是西方从来没出现过中西马对话这种题目，西方的主流哲学是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能对话；西方哲学是轻视中国哲学的，也不可能对话。相互影响是有的，对话不可能。至于现在所出现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对话，这是用一种哲学来消解另一种哲学，是嫁接，不是对话。中西马对话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是社会的变化带来中西马真正平等对话的可能性。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讲坛上可以讲授，但是不能够进入西方哲学的主流，中国哲学更不能进入它的主流。所以，不存

在对话的可能。中国不一样，从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出发支持对话。

可是，我们尽管是社会主义国家，前三十年也没有出现对话的条件，虽然毛泽东早在延安的时候就对英国记者讲过，虽然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西方文化，但这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实际政策并不一样。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基本上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所以真正的对话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创造了这个条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一致的。但这前后的变化，不是社会制度的原因，而是政策的原因——文化政策的原因，现在实行的文化政策，是要建立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西马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对话有可能，又必要。为什么？这决定于哲学自身。哲学是多样性的，没有唯一的形态。所以，西方人老说中国没有哲学，这是毫无道理的。哲学没有唯一的形态，哲学只有民族性。西方有西方哲学史，中国有中国哲学史，而哲学史中人物总不一样。一样的话还有什么意思，一样的话有没有意思？有意思就等于不完全一样，就这么简单。哲学是多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不一样是一面，还有一面是一样。如果仅仅是不一样的，你就不可能对话，就像你把鸡蛋和苹果摆在一个篮子里，没办法。哲学是多样的，但哲学有共同点。哲学不管怎么多样，总有共同点。都是哲学，它的差别绝不比颜色和甜的味道差别大。共同点在哪里，所有的哲学都是关于宇宙，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基本原则和观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一样，哪一个哲学都是这样。但是，不同的哲学，研究的问题不一样。问题可能不一样，但哲学中的哲学共同点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根本原则，这个意义上是一样的。这样才可能对话。所以，多样性要求对话，共同性使对话成为可能。要不然谈不到一起，没办法对话。这是第二点，可能对话，为什么，它都是哲学。需要对话，为什么，因为是不同的哲学。

第三点，对话是困难的，有难点。因为，它是不同的哲学，它各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各有自己的基本范畴和概念，它是属于不同类型的哲学。中国哲学，说是中国哲学，实际上就那几家，但我们中国哲学各派地位不同。由于儒家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我们把儒家哲学作为中国的一个代表，所以我说中国哲学是人生伦理哲学占主要类型的哲学。当然，还有其他的内容。墨子有认识论的特点，孙子有军事辩证法，道家也讲本体论，讲辩证法，难易相成，比如庄子，有丰富的辩证法，但主要归结为一点，就是做人。

西方哲学的特点是什么，我把它叫做思辨智慧型哲学。思辨性和智慧型



是其特点。他包含丰富的智慧，但也有思辨性。所以，就抓住一点，西方哲学有严密的逻辑和完整的体系。中国哲学没有这条，比如说《论语》，一条一条的，子曰：“学而时习之”，完了以后是别的，比如讲仁政等，他不是讲严密的精神逻辑。所以，西方哲学是思辨智慧型哲学。

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性哲学。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中国的仁政哲学，也不是西方的思辨智慧哲学，而是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实践性的哲学。不同的哲学对问题的看法不完全一样，这是它的难点。

我提两个简单的例子，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天，一个是人。这个天在中国哲学里最主要的意义是道德之天、意志之天。天有道德之天、意志之天，它是天子能够做主的。所以，中国的天人合一很大的特点是带有这种色彩。在中国也有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所以，儒教的天只有意、志、理，有道德心的那个天。西方哲学则不同，只有宗教的天，敦华知道，西方的哲学里只有自然，所以西方的自然哲学比较发达，就是探求自然的奥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它既不是中国的天，也不是西方的纯粹自然，而是世界。世界是既包括自然，也包括社会，包括人的一个辩证的统一。天是世界。中国的天搬到西方是不可理解的，天人合一在西方哲学无法理解。西方的自然在中国哲学这里也不可理解，道家也讲道法自然，人自身就是自然，道法自然就是自然人，它不同于自然辩证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概念，和中国哲学的天的概念不同。有人老说中国哲学的天是天下之意，但其实这个天下的范围很小。孔夫子周游列国，其实也就是那几十个县，在今天的中国就是跨了几个省。概念不一样。天在中国哲学中不能离开中国来理解，自然不能离开西方哲学，世界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不然就无法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老拿本体论的概念来套天人合一，就无法理解。把中国哲学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来理解，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怎么套，也套不出来。

这些东西，比如说孟子也好，朱熹也好，王阳明的南镇看花也好，只能在中国哲学范畴里面，才能给予合理的解析，离开中国哲学就无法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对我们的教导。它是指人际间的相互关系，在你的亲人，在你的朋友，在你的家中，推广到其他国家也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因为那些国家都是周姓的子系王国，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而现在全世界霸权主义那么厉害，美国霸权主义搞到你门口来了，还说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你说得通吗？所以要分情况，毛泽东 1937 年就说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政治上是错误。在国际上斗争，在阶级上斗争的时候，往往是己所不欲施之于人。那孙子都知道，兵不厌诈，厌诈什么意思？任何哲学都要分清语境。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包括和为贵，孔夫子还讲，“知和而和，不知其可也”。和为贵你还讲“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有他自己的道理。1948 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打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张申府发表文章，呼吁和为贵，中共发表文章，驳斥他。因为战争打得最热闹的时候，马上看着华北要解放，结果这时候搞和为贵，什么意思？和为贵是有条件的，每一个哲学命题都是有条件的。西方哲学不是普世价值，中国哲学也不是普世价值，只有什么情况下才是普世价值？只有把人类掏空了，只剩下概念，那毫无意义。有人说你看孝是不是普世价值，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提倡儿子打老子的。可有人说也有儿子打老子的，因此孝不是，这有什么意义呢？孝的内容从讲不孝有三，到现在讲小孩孝顺父母，概念虽然一直没变，但具体内容却一直在变。现在都讲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这些内容是不是普世的？我说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民主、自由、人权，人人要说，人人会说，每个政府翻过来翻过去都是这些玩意儿，但内容完全不一样。你想你一人一票叫民主，我讲人民当家叫民主，意义能一样吗？民主是普世的，你不要民主，人吃饭是普世的对不对，我吃饭，你吃肉，或者我吃米，那能一样吗。所以，在纯概念的范围里，它是毫无意义的。只要进入内容你就可以发现内容都是具体的。

中国的哲学是道德哲学，人之所以为贵，人为万物之主，人有情有欲有道德，人是道德的存在物。所以，在中国，人是道德人。在西方，人是自然人，人得自生自保，所以人追求利益合理合法。所以，斯密的国富论，他的人性自私论既是西方哲学的原则，又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这是自然人。马克思主义提倡社会人，人的本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既不天生是圣人，也不天生是有道德的人，也不是西方所说的人天生都是自私自利的，这种人不是社会的人。社会的人总在不断改造自己，使自己不断完善。人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之下，包含有不同的含义。作为道德哲学，天对于中国老百姓的重要地位是不能否认的。中国老百姓有愿望，只能求天求地，天是不可欺的，自然，道也是不可欺的。从道德的意义上，不可能灭天；从生态学的意义上，也不可能灭天。所以，我们可以从天人合一的智慧中吸取当代人所需要的智慧，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的。但要是把古代人的天人合一，完全解释为当代人



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那不是比马克思主义早发明了吗？现在不是解释学吗，解决过程中，他原来是什么意思，你先把它弄清楚。

但还是可以对话，为什么？有这些条件，就是说，像今天我们讲的，这里的题目是可以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是什么，不足是什么？看看另一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精华是什么，不足是什么？研究哲学不能自恋，不能搞本质哲学，不能说，我搞海德格尔哲学，就海德格尔哲学万岁，我搞儒家哲学，就儒家哲学万岁。现在还是这一套，我搞马克思的，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万岁，这样就不能对话。这叫粉丝哲学，研究者就不叫研究者，叫哲学粉丝。这样不能对话，对话是平等的对话，什么意思呢，相互交流、切磋，这样才可能提高。这是第三层意思。

第四层意思讲一讲，对话的好处是什么？中西马对话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个大的智慧源泉。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不干涸，必须尊重和学习中国传统哲学、学习西方哲学，马克思当年就是这样的。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与他尊重德国古典哲学、尊重希腊罗马哲学、尊重世界文明有密切关系。对马克思主义来讲，就是要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马克思创造马克思主义就要求我们不能让今天的马克思主义闭关自守。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里可以得到两点好处：第一，丰富马克思主义；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必须中西马对话，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是必要的。只有真正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熟悉当代西方哲学，我们才能了解当代西方的思想动向，因为哲学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搞哲学的人不懂得西方哲学，就不可能实现时代化。

老实说，我们现在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闭关自守，既无文采，也没有思想。在西方，即使柏拉图到今天也受欢迎。所以即使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这一点来看，也有利于我们改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能提供某种观点。对中国哲学来说，很简单，中国有没有哲学，当然有；中国有没有哲学思维，当然有！中国有哲学家、哲学著作，怎么没有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家的著作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你要把历史的一部分变成由人来书写的中国哲学史，这是另一个问题。这是个直接反映和被反映问题，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要理解和把握历史现实。怎么样把历史写成一部有规律可循的

可理解的中国哲学史。我认为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方克立他们编的书指出，如果说中国哲学回复到以儒解儒，以经解经的地步，就没有中国哲学史。一定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客观认识中国哲学。你不了解西方社会和西方的变革，就无法理解西方哲学。所以说这个对话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得到思想营养，西方哲学可以得到思想上的指导。

杨河：谢谢陈先生的讲演，陈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大家，陈先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观念框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以西方优秀文化为营养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那么我们接着今天这段话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和儒家文化的关系在当代应该怎么处理，这是当今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知道方克立先生在这方面做过很多思考，发表过很多真知灼见。他曾经呼应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创新的尝试，他倡导“马魂、中体、西用”的重要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有请方先生做讲演。

方克立：陈先达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讲话中气很足。我经常向陈老师请教，半个多世纪了。说“对话”，不敢当，我是来请教老师的。其实陈老师也能代表中国哲学，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都很精通，对当代中国哲学的贡献很大，一直是我的老师。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西、马“文化”对话，而是偏重于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上次黄楠森老师讲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不能一般地讲中、西、马文化对话。我赞成这个看法。当然马克思主义里面也包含有文化因素，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今天我们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要充分利用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把它们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开展中、西、马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曾经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看法，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三者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起来。我认为这种看法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文件中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文件明确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



而且是“第一要义”，在分别为“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居于“灵魂”的地位。也就是说，它是“魂中之魂”。文件中也有“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论述。在讲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时，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在这个重要文件中，实际上“马魂”“中体”“西用”都讲到了，马、中、西分别处于“灵魂”“主体”和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的地位。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这三种资源都是不可缺少的。开展中、西、马对话和互动，就是要把三者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充分调动起来。

我想从前些年开展的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说起，提出一些看法向两位老师请教。在这场讨论中，中国哲学学科受到了严峻的“合法性”质疑，有人甚至提出了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如果中国有没有哲学都成为问题，那么又何谈与西哲、马哲平等对话呢？所以这是一个对话的前提问题。

大家知道，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学科创建至今还不到一百年，第一本叫做《中国哲学史》的书是谢无量先生写的，出版于1916年。到1919年，胡适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3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出版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胡、冯的著作都是先有西方哲学的问题框架和研究范式，然后到中国古代文献中去找相似的材料，整理出一个中国哲学发展的线索来。金岳霖先生在审查冯著时就提出了问题：这样写的中国哲学史，到底是中国哲学的历史呢，还是哲学（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5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个时候讨论孔子哲学也好，讨论老子哲学也好，总是在唯物、唯心的定性问题上争论不休，显然还是受到西方哲学研究模式的影响。所以，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建设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有些人走到了极端，不但全盘否定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绩，否定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甚至走到根本否定中国有哲学。

这个问题在21世纪初一度成为热点，2003年曾被评为年度的十大学术热点问题之一。黑格尔是说过“真正的哲学是从西方开始的”，孔子算不上是一个“思辨哲学家”，在他那里只有一种“道德哲学”。但是他并没有否定“道德哲学”也是哲学。有人喜欢引用德里达的话，说中国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在西方一些大学，哲学系一般不开中国哲学课，而

是把有关中国哲学和思想的课程放在东亚系。特别是日本东京大学老牌的中国哲学研究室，曾经很有影响力的，到20世纪90年代初也改名为“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就是说，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量，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确实有思想、有文化，但是没有哲学。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也影响了一些中国学者，包括一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于是提出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在讨论中，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做出了回应。一是从哲学的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来回应。不少学者都表示赞成张岱年先生的看法，就是把哲学看作是一个“共相”“类称”，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都是其“殊相”，都是“特例”。如果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否定中国有哲学，那就是用一种“殊相”来否定另一种“殊相”，显然是不合理的，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二是从现代性与民族性统一的角度来回应。一些学者指出，近百年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不是用“以西释中”“以夷变夏”“汉话胡说”一句话就可以简单否定的，这样概括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非常重视中国哲学的民族主体性建设，包括梁启超、冯友兰和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学者，也包括侯外庐、张岱年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一直是近百年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主流。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但是其主流方向、其“合法性”不容否定。

上面两个方面的回应是必要的，也是有相当说服力的。但是在“破”的力度很大、“立”的成绩甚微的“合法性”讨论中，还不足以成为推动中国哲学学科健康发展的一种主导力量。事实上非常需要从中国哲学主体性建设的角度正面做出回应，用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的特点是什么，与西方哲学有什么“同”，有什么不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与西方哲学有所接触、交流以前，中国哲学已经独立发展了两千多年，中国哲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内在发展理路，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包括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这个基本事实是不能随意否定的。

比如陈老师刚才讲到天人关系问题，天人关系就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一个基本问题。司马迁说他做的工作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对中国哲学基本问题很好的概括，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概括出来的。哲学要对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问题做